

# 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都可以称之流氓

——鲁迅对流氓性与流氓意识的批判

● 王骏骥

我在1993年第9期《鲁迅研究月刊》上刊载的《鲁迅郭沫若侠义观比较论》一文中曾提出:鲁迅“对流氓行为和流氓意识进行了广泛的多层面的揭露和批判……上至统治者,下至阿Q式的流民,鲁迅揭示出的中国社会流氓行为与流氓意识流布之广泛,根柢之深固,真令人惊颤”。这种流氓意识“不仅对市民阶层,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都有着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惜,至今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此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流氓行为和流氓意识至今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对整个思想界与学术界而言,此话并不为过。但近些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对流氓(或曰游民)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扎实的、持之以恒的研究。王学泰就是此中已卓有成绩者。他从1988年即开始关于游民、游民文化的研究,孜孜矻矻历经十年,终于完成了他的大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并于1999年9月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但是,鲁迅对流氓意识与流氓性的揭示,其广阔的内涵和深刻意义,仍需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进行深入的开掘、揣摩和研究。

## 一、流氓与流氓性

什么是流氓呢?还得先从游民说起。游民(包括流氓)不是一个一句话可以定义的概念,他是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他包含了这一类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方式,以及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中国近代最早从理论上注

意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1919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题为《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杜亚泉提出:“劳动阶级中亦因生齿过繁,天产不辟,产出过剩的劳动阶级。即现无劳动之地位,或为不正则之劳动者。例如我国之兵即此过剩的劳动者之一种。他如地棍、流氓、盗贼、乞丐之类,亦属之。此等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游民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游民称之为“游民无产者”,说他们:“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也说到游民是:“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游民(或游民无产阶级、或流氓无产者)的定位,是依照毛泽东的说法为指导的,所出版的各类辞书中的定义也基本上与此一致。王学泰对游民的理解与上述说法略有不同。他“在为游民定位时是从这些人们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出发的,而不是从他们的思想倾向、道德品质,或者生活来源、生活状况及其与某种职业的关系来确定其身份的。”他认为:“‘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传统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特点

就在于‘游’。”“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手段居处也不固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他们以出卖劳动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sup>①</sup>学泰对游民范围的限定比较宽广，只要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秩序（或曰社会结构），以“游”为其特征的都可称之为“游民”。因此，他认为游民除了“土匪、流氓、乞丐、娼妓、江湖术士以及兵痞、盐梟、私贩”等以不正当手段谋生者以外，还应该包括大量的江湖艺人以及江湖侠客、游方僧人等，他尤其重视行走江湖的说唱艺人和戏曲艺人，认为他们是“游民文化”的生产者。我同意学泰对游民的定位，这样比较全面。无论从什么角度和范围确定游民，流氓是从游民中产生出的一类群体则是无疑的。但是学泰认为“不能把游民与好逸恶劳、欺压良善的流氓地痞等同起来，流氓地痞不过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他们在游民中也属于少数”<sup>②</sup>。不能把游民与流氓等同起来没有问题，但说流氓是游民中的“腐败分子”的提法则值得斟酌。腐败者变质也。我以为，流氓作为游民中的一类，虽属少数，但他是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的阴暗一面的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者。<sup>③</sup>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游民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sup>④</sup>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

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如果说这是游民性格的主流和本质特征，那么，流氓正是这些性格特征本质的鲜明代表，何为变质与腐败呢？

流氓在思想意识、性格特征上集中体现了游民群体对社会最具腐蚀性与破坏性的一面。其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反叛性、反社会性和无确定的价值尺度，以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为核心，一切理论、口号乃至道德宣示都是谋利的外衣，小到“揩油”占点小便宜，大到谋王夺位，或以堂皇名义欺诈，或赤裸裸以卑劣下流的手段巧取豪夺，只问目的而不择手段，泯灭了一切道德良知和羞耻感。如果从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文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各种角度考察游民作为一个阶层或群体，他的产生、发展及其在社会、历史、经济、军事等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流氓当然不能代替整个游民群体。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将“游民生活与游民文化及其在文学上的表现作为考察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则将视点更多地投向了游民知识分子（以江湖说唱艺人为主）和通俗文艺作品及其与游民的关系上。但是，如果从国民性格、国民心理以及社会风气，即鲁迅所说的“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角度来考察的话，那么，流氓作为游民群体的代表就最合适不过了。因此，鲁迅是将游民即视为流氓的。不仅如此，鲁迅还将流氓性、流氓意识视为国民性的组成部分。鲁迅塑造的“阿Q”这个典型形象，就是一个由贫雇农沦落为流浪于城乡之间的，颇有些流氓性的游民形象。当然，鲁迅绝不希望将阿Q的形象局限于流氓样或瘪三样。他说：“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sup>⑤</sup>。而应该是“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sup>⑥</sup>。那是因为，鲁迅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sup>⑦</sup>。他有更广阔、更丰富的内涵，而不是

某一类人的代表。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国人的灵魂中有流氓气,或者说我们的国民性中有流氓性,应该是合乎逻辑的。若说我们的身上有些“阿Q”性或“精神胜利法”,大约都可接受,似乎那是环境所迫,生存所必需;但若说我们有流氓气,恐怕大多以为是侮辱。但是,鲁迅却毫不留情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国人,下至生计为难的平民百姓,上至天命所授的皇帝,如“汉的高祖,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sup>⑧</sup>的刘邦都带着流氓性,鲁迅尤其注重揭示的是知识分子的流氓化问题,如“巧滑善变,毫无特操”(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灵魂),也就是说,流氓性格、流氓意识已经泛滥,竟浸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中去了。

## 二、流氓性与专制及农民革命

游民是劳动力过剩的产物,流氓性格、流氓意识的泛滥则是专制政治的产物。集权专制政治体制的强大压迫,培养出两面相反相成的国民心理,其一是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思不出其位”安于做奴才而且只望做稳了奴才;其二则是对专制权威的渴望,普遍热切地希望通过获得和加盟于专制权威,而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彼可取而代之”是“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sup>⑨</sup>。不能,则可去为权势者“帮忙”或“帮闲”,“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sup>⑩</sup>。

做“帮忙”与“帮闲”是需要点流氓才能的,他需要混去羞耻(鲁迅说:“把人的血肉廉耻当馒头似的吞噬”<sup>⑪</sup>正是专制的功能),善于吹牛拍马、插科打诨。而要实现“最高理想”“取而代之”更非一般人所能成功。在集权专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等级网络中,“思不出其位”自然不行,他必须挣脱一切既定道德、原则、规范的约束,随机应变,一切方针、政策、理论都必须与“取而代之”的

实际相结合,而这正是流氓所特有的性格和才干。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着:只有流氓中的大才或颇具流氓性、深谙流氓手段的“英雄”才能在改朝换代中实现“最高理想”“取而代之”,获得成功。

王学泰梳理了中国两千多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发现“从秦朝到清代,在中国主要疆土上大约建立过三十个朝代和政权”,而改朝换代的第一代统治者,即开国之君,除了以异族入主中原者外,游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竟占绝大多数。在“坐龙庭”之前,他们就是农民革命军的领袖,在这方面,被鲁迅称之为“无赖出身”与“无赖儿郎”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是最典型的例子。学泰在对朱元璋“从游民到帝王”的个案分析中,还充分展示了朱元璋在一切围绕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一切从实际出发,随机缘而变,十分熟练地运用着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技巧,在改朝换代的复杂尖锐的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流氓才干。他同时说明,“而那些受到中国主流文化长期熏陶的文人士大夫们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则缺乏竞争力”,也就是说,与专制集权制度对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则的立场与手段,原则与规范只能带来失败。这真是令人尴尬的结论,但它却是历史的事实。李慎之读了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并为之写的《序》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无赖儿郎”一越而成为帝王。这是多么大的变迁,他对国民心理产生着多么大的刺激和影响啊!所以,鲁迅说,“彼可取而代之”是“谁也想取”的,虽然能取得的程度不

同。学泰也说：“游民阶层是社会动乱中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在社会变迁中他们也往往是得利最多的阶层，因此，许多其他阶层的人们（包括政治界、军事界、学术界乃至文化界）不管如何对游民、游民的处事方法、游民的思想意识表示鄙视、厌恶甚至痛恨，但是在他们现实生活中要获得成功便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游民，这真是无可奈何的！”

这又涉及到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的认识问题。我在拙作《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sup>⑫</sup>中曾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鲁迅从来没有把中国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动力来看待，恰恰相反，在他的眼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只是‘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sup>⑬</sup>，而农民军领袖与封建皇帝‘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不过是‘成则为王败则为贼’<sup>⑭</sup>。”并且说：“过去，我们对于鲁迅关于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论述一直是回避的，但无论如何终究要给予研究和正视。”这个问题今天虽然已不再讳莫如深，但仍然有些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最近，《鲁迅研究月刊》上刊载的《黑暗时代的双刃剑》<sup>⑮</sup>一文，是专门谈论鲁迅的农民战争观的，他对鲁迅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破坏性的“独到而深邃的剖析和批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阐发，写得很好。但是，为了回避鲁迅与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观点对立与冲突，却说：“两位伟人评价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各自角度不同，在具体论述上也有很大差别。毛泽东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自觉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作了总体、概括的纲领性评价；鲁迅则根据自己的独特体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从人道主义角度直观地体悟和把握着一些具体的农民战争和农民战争首领。”明确地说，就是：因为鲁迅选择的是特定的角度，因此他“更多地看到了它的负面影响与负面作用”，而“没有系统、全面地评价过农民起义和农民

战争在历史上的客观地位与作用”。这显然有些躲闪和规避，论点不够彻底。如果毫无顾忌地正视鲁迅对农民革命的论述，应该不难看出，鲁迅对农民起义及其领袖的看法绝不是某一个角度和某一个侧面，而恰恰是对中国农民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整体性揭示与概括，是他的历史观。鲁迅分明是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样一种“所谓‘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sup>⑯</sup>而这“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正是异族入侵或农民战争的时候，也就是老百姓哀叹“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时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sup>⑰</sup>。这不就是鲁迅对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最完整、最全面、最概括、最简明的表述吗？鲁迅还明确地说，农民革命军取得胜利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后，“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sup>⑱</sup>。也就是说，一切照旧，并无进步。再如，鲁迅对“阿Q式革命”、“寇盗式的破坏”、“朱元璋的杀汉人与摆架子”、“张献忠的残酷”、“《水浒》的‘替天行道’受招安”、“暴君与暴民”、“争夺一把旧椅子”等等，诸多有关农民革命与农民领袖的精辟、形象的描写与论述，人们都已经很熟悉了，不必再引述。但他明白告诉我们的是：农民革命与帝王专制所构成的所谓“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非但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反而成为了中国历史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

现在，再从游民、流氓与农民革命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农民革命问题，就更能看出鲁迅思想的深刻与独到。前面说过，农民革命队伍的领袖和骨干大多是流氓或惯走江湖颇具流氓性的游民与游民知识分子，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次之则是“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他们最有效的

手段,就是不择手段;救民于水火、均贫富、替天行道、济世安民是他们争取民心、扩大势力的冠冕堂皇的口号;狡诈欺骗、掩盖历史、神话自己、残酷斗争、排斥异己是其实用的策略。一旦夺得天下、坐上龙庭,由于他们深知造反者的威胁,他们对反对自己或可能反对自己的人的统治与镇压就更为严酷,正如鲁迅所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sup>⑩</sup>这种“革命”非但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给社会心理造成了难以消除的、极其恶劣的影响。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反抗压迫、争取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有其合理性。但是,以争做“奴隶总管”为目的,以“不择手段”为智慧、方略的“革命”,绝对没有什么进步性。过去我们往往为某种“目的”与“理想”所眩惑,即使是好的“目的”与“理想”,而忽略手段的进步性,“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sup>⑪</sup>。

### 三、 无特操——知识分子的流氓化

鲁迅关注和揭示国民性中的流氓性,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即在知识分子身上的流氓性与流氓意识问题。鲁迅的惟一一篇专门谈流氓问题的文章《流氓的变迁》,就是在发现并批评了当时一些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倾向后,为追溯中国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历史渊源而作的。而且,鲁迅揭示知识分子流氓化的对象并不是那些在身份和生存方式上流氓化了的知识分子,即那些已经流落江湖的游民知识分子,如江湖艺人、江湖术士等,而却是在社会上正经顶着文人、学者、名流、革命的批评家、文学家等等桂冠的主流知识分子,也就是说鲁迅是在普遍的意义上关注和揭示知识分子的流氓

化问题的。

鲁迅认为,知识分子的流氓化的主要表现是“无特操”,也就是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操守,没有固定的价值标准,这正是流氓的主要品性。因此,鲁迅在著名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批评当时一些革命青年知识分子的流氓化倾向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流氓性表现,作出了涵盖古今的、格言式的高度概括:“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称之为流氓。”鲁迅还将这种“无特操”者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他说:“看看中国的一些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sup>⑫</sup>鲁迅还将“无特操”者称为“伶俐人”和“巧人”,无论中国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种人“都能变出合式的态度来”<sup>⑬</sup>,永远都不会吃亏的。鲁迅还针对这种“无信仰”、“无特操”现象,称之为“吃教”、“吃革命饭”的,并说,“吃教”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sup>⑭</sup>一语道破了“无特操”的本质——“吃”也。什么信仰,什么主义,什么革命,都不过是获利的招牌、营私的工具。鲁迅还指出,“无特操”也和中国国民性的其它弱点一样,是中国的传统“国粹”,尤其自南北朝以后,异族入侵、暴民作乱,社会动乱愈是频繁,中国知识分子的“无特操”、流氓化的倾向也就愈加普遍,因此他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sup>⑮</sup>到了现代“城头变幻大王旗”,由于战乱频仍、主子无定,再加上上海滩半殖民地的特色,知识分子的“无特操”、流氓化倾向更趋严重,就如鲁迅所指出的,由于“时势的飞速的变化”,中国文坛“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

消极方面走，是瘪三。”<sup>②⑤</sup>因此，鲁迅对知识分子流氓化的批判也就愈加尖锐。如：有本领“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的“聪明士大夫”；善于论证饥民采食的树叶“极合于卫生”的学者；“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帮会式的革命文学家；操着五花八门的阴面战法，恐吓、辱骂，动不动就要“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利害”，“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锻炼人罪，戏弄威权”“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的新英雄……这些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愈趋普遍化的流氓化现象，在鲁迅的笔下一一被透视出来了。

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和灵魂，知识分子的品性代表着社会的品性。因此，鲁迅对中国知识分子“无特操”、愈趋普遍的流氓化倾向十分忧虑。他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即以“无特操”为特色的北齐式道德——笔者)，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sup>②⑥</sup>“伶俐人”，“这一流人是永远胜利的，大约也将永久存在。在中国，惟他们最适于生存，而他们生存着的时候，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命运。”<sup>②⑦</sup>他还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象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遭的。”<sup>②⑧</sup>鲁迅多么殷切地希望不再反复着先前的命运，多么急切地希望中国真正的知识阶级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和主流啊！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什么样子呢？——“真的知识阶级

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sup>②⑨</sup>鲁迅的这些论断不是值得不断重温么？

#### 注 释：

- ①②②②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 ③ 如果说游民的群体性格、思想、行为还有光亮一面的话，如抽象化了的“讲信义、重义气、扶弱抑强”等。
- ④ 传统社会中的“士、农、工、商”。
- ⑤ 《给刘砚的信》，《鲁迅全集》13 卷 P. 679。
- ⑥ 《且介亭杂文·寄 戏 周刊编者信》。
- ⑦ 《集外集·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 ⑧ 《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 ⑨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 ⑩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 ⑪ 《集外集拾遗补编·娘儿们也不行》。
- ⑫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版。
- ⑬ 《坟·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 ⑭ 《华盖集续编·谈皇帝》。
- ⑮ 见《鲁迅研究月刊》2001 年 6 期。
- ⑯⑰ 《坟·灯下漫笔》。
- ⑱ 《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 ⑲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 ⑳ 《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 ㉑㉒ 《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 ㉓㉔ 《准风月谈·吃教》。
- ㉕ 《且介亭杂文二集·文坛三户》。
- ㉖ 《准风月谈·扑空》。
- ㉗ 《书信·350423 致萧军、萧红》。
- ㉘ 《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